

向世界介绍真实中国的大卫·柯鲁克

□ 孙东方



大卫·柯鲁克（1910—2000年）是一位犹太裔英国人，是与白求恩、斯诺同时代的杰出人物。20世纪30年代末，他怀揣着共产主义信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从此把根扎在了中国。他在中国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关心、支持并积极投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英语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革命把他吸引到中国

柯鲁克青年时代，家道中落，为了生计，他只身来到美国。他到美国后不久，就遇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这时，他阅读了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使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热爱和追求。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期间，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35年，他回到英国并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成长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西班牙期间，有两件事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与白求恩结为好友；二是阅读了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被书中描写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为开辟新天地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所吸引。

1938年，柯鲁克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其间，他接触到一些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历史，并认识了他的妻子伊莎白。1941年，他和伊莎白来到大渡河边，举行了红色订婚仪式。柯鲁克本想去延安，但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他决定立即回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回国后，柯鲁克参加了英国空军。在他的影响下，伊莎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加拿大女子军团的一员。

二战胜利后，柯鲁克进入伦敦东方学院研究中国问题，但仍然向往着曾经工作过的热土，渴望了解中国解放区的情况。1947年，柯鲁克夫妇持英共介绍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店村，调研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一路上解放区，他们立即被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所吸引。在十里店的几个月内，柯鲁克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解放的伟大壮举所感动。根据鲜活的一手材料，柯鲁克夫妇写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阐述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给农民带来的重大变化及其可借鉴的经验。通过观察1948年十里店土改复查工作情况，后来他们又写作了



柯鲁克夫妇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柯鲁克还拍摄了近千张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积极投身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

十里店调研结束后，柯鲁克本想回国。但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列入日程，急需培养大量外交和外语人才。为此，中共中央在河北南海山村建立中央外事学校，盛情邀请柯鲁克夫妇担任英语教师。负责筹备工作的王炳南对柯鲁克说：“留在中国工作吧！北平就要解放了，一个新的国家即将建立，我们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外交官和外语人才。”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们。基于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柯鲁克决定留下来任教，而且一留就是50多年。处在战争环境中，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不顾危险、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外交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后来，这些人才很多都成为驻联合国代表、驻外大使和驻外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外事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外国语学院。柯鲁克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担任英语系副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为正规化英语教学和学校建设呕心沥血。他自编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建立教学体系。他多年坚持每周用一个晚上，把学生请到家里，用英语交谈、交流学习体会。他还邀请了斯特朗、文幼章等国际知名人士来校演讲，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

60年代初，柯鲁克接到利兹大学的邀请，准备回英国工作。但此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感到，这时正是中国最需要他的时候。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感情，让他再次留下来，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肩战胜困难。为了提高边远地区的外语教学水平，他先后到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开办师资班，培养教学力量。在几十年如一日平凡伟大的工作中，柯鲁克为中

国人民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荣誉面前，他始终很谦虚，经常说，自己得到的远远超过了付出的。

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柯鲁克不仅奔波于大江南北的教学一线，活跃在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前沿，并且利用公共外交场合积极宣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941年，柯鲁克回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途经美国时，他和斯诺、艾黎等进步人士用中国抗战壮举，帮助说服美国劳工组织，增加了对中国工会组织的捐款。柯鲁克写了多篇通讯报道，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向西方深入介绍中国解放区胜利进展。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出版，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产生了积极影响。197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出版。该书向西方真确地描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了解。

柯鲁克多次到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访问，每到一处，都利用一切机会介绍中国的情况。他写了大量文章和通讯，向世界积极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新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还经常邀请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国外来的朋友到家里，现身说法，使他们对中国的有正确的认识。他的家成为一个“中国橱窗”，一座连接国际友人和中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1993年，柯鲁克写下遗嘱：“如果觉得为我做某种纪念恰当的话，不妨考虑在某处放一个标牌，上面写道：大卫·柯鲁克（1910—），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及其前身任教。”如今，这段话已刻在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为他树立的铜像石座上。

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的指南指针，作为攻坚克难、战胜风险的借鉴启示，保持宏大历史视野，引导广大干部用历史观照现实、指引未来，分析洞察第二个百年教育的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不断提升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目标愿景、政策举措，使落实的过程成为提升政治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谋划能力的过程。要始终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确保教育系统安全和谐稳定。要用历史经验，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始终把办好教育作为使命召唤、作为理想信念、作为永无止境的高尚事业，砥砺前行、淬炼灵魂，鼓起干事创业精气神。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踏上新征程，教育系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相结合，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与巡视整改相结合，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书宋仁宗，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揭开了变法序幕。“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保马法”，其用意是以民力养马，结果政府却把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变成了扰民之政。实际上，“保马法”并不始于王安石，整个宋朝一直都在努力解决养马问题，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向敏中，也曾提议把国马（国家的马，一般用于战时）散于民间外厩，这一设想最终在河北地区进行了试验。

为何养马这件事对于宋朝这样重要呢？

中原家马从哪里来

家马指一种被驯化的马，可以用于耕田、运输、比赛、打仗等。生物学家曾在距今至少365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山东中华原马等最古老的中国马化石。不过这些史前时期的马化石属于野马，直到商代晚期家马才开始普遍在中原文明的遗址中出现，像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就有不少车马坑。虽然马这种动物很早就在中原出现，家马却并非最早来自中原。

一部分考古学家支持马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乌克兰被驯化成了家马，另一部分人认为家马最早出现于哈萨克斯坦的柏台地区。无论如何，我国中原地区的家马常被认为是从西方传入，欧亚草原就是这一文明的传送带。

家马从中亚进入中原地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是通过甘青地区，经河西走廊到达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这段路也是中西交通上的“丝绸之路”。第二，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很强，北方蒙古马和中原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因此，家马传入中原的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条自西向东，经新疆从甘青进入中原，另一条则是从蒙古高原南下。

历代中国战马的引进，也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原常见的“大宛马”“乌孙马”“蒙古马”等品种，就是通过战争或商贸互市流入的。大宛马就是传闻中的汗血宝马。汉朝曾经从西域获得一种骏马，名为“汗血马”，汉武帝为向大宛国索取这种宝马，不惜发动多次战争，因此“汗宛之战”又叫“汗血马之战”或“天马之战”。汉武帝身边的谋臣东方朔在《神异经》里说这种马来自大宛，高大雄健、日行千里，跑到正午时分身上会渗出如血一样的汗水，令人啧啧称奇。而科学研究认为，汗血马其实是得了由马副丝虫寄生引起的“切肤病”。

乌孙位于现在的新疆昭苏县，乌孙马是伊犁马的前身，是中亚哈萨克马的一种，其短跑能力要优于蒙古马。蒙古马则在蒙古征服欧亚大陆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蒙古马相对于其他马种体型比较矮小，但长跑速度以及耐力并不输于别的马，成吉思汗征战南北时，所骑战马都是蒙古马，号称“马马之利取天下”。家马出现后，战马对于一个王朝军事实力的提升尤其重要。

强大的王朝必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在远古时期还只是一个和西戎接壤的小部落。然而，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部落却非常擅长驯马、驾车，从虞舜到商周，他们多次向中央王朝提供马匹，以御马为生，甚至连“嬴”这个姓氏也是因养马而得之。《史记·秦本纪》记载了周孝王的一段话：“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后来这个养马部落又获得“秦”的封号，是为秦朝名称的由来。

最早战场上的马是以车阵的形式出现，秦国在统一六国时曾一次战役出动了3000辆战车，是绝对实力的体现。这种作战形式虽对敌军有碾压式的伤害，但灵活度却不够。相对而言，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的骑兵，则大大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性和突击能力。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脑子很灵活，在赵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并与秦、韩接壤这样的危局之下，他看到了骑兵的优势，决心效仿“胡服骑射”。不到一年时间，赵武灵王就训练了一支十分强大的骑兵队伍，第二年便率领队伍打败了中山国，不久又收服了楼烦、林胡，将国土扩大了数倍。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国以马为强弱”，认为汉、唐两朝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畜马业的发达。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奉命征战匈奴，不巧中途碰上了匈奴的左贤王及其麾下4万骑兵。这位匈奴畏惧多年的“飞将军”，面

中原王朝为何要驯马

□ 李轻尘

对乌压压的匈奴铁骑之时，几乎身陷绝境。穷途末路只能背水一战，最终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直到张骞的部队赶到，才扭转了被剿灭的命运。自此匈奴铁骑的阴影也一直萦绕着汉武帝，这位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便在选马、铸甲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因而才有对大宛马不惜代价的寻索，后来才有了汉帝国的铁骑雄兵。

利用西汉开拓的通往西域之路，唐朝和西域各地的交流互动也更加频繁、顺畅，借此培养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骑兵。从唐高祖开始，就不断努力改良马的品种，唐太宗设立专门的养马机构，饲养战马的人其地位也提高不少，孙悟空眼里的“弼马温”这种小官在当时还是很有职业吸引力的。

中唐以来，因失去河西之地而失去军马来源的困境一直延续到了宋朝，这是王安石提出“保马法”，让民户自愿承担养马责任的原因之一。宋神宗时期，北宋国马还能有个10万匹，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国马只有寥寥1800匹，军中无马可用，宋朝对周边政权的作战屡战屡败。

到了南宋，朝廷养马的成效实在不佳，扬州马监养出来的马，常被认为“壮不如驹”，根本无法作战马。其中一个原因是马种的纯度不佳。养马民族都很重视马种的纯度，一般不会让它们进行杂交，而中原许多良马都是从游牧民族引进，和中原马进行杂交后往往第一代还能保持优良特性，之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加上宋朝中原肥沃的养马地也被他人占领，既没有好的种马，也无法进行可持续的培育和饲养，想建成一支强盛的骑兵基本不太可能。

和宋朝不同，明朝在东自大宁（今赤峰地区）、西至守夏地区有肥沃的牧马地，并在万历三年（1575年）明令每年和蒙古等互市交易3万多匹马，组建了强悍的三大铁骑部队。其中在袁崇焕指挥下的关宁铁骑更是大杀四方，尽管没能挽救大明颓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续命作用。

马与人的感情

驯化后的家马，不仅可以运输、耕地，其更大作用是成为战马，组建强大的骑兵对抗外敌。此外战马因和主人长期作战，生死相依，人马之间也常产生浓厚的情谊。刘备坐骑“的卢”奔跑起来迅如闪电，在后有追兵情况下拼死一跃救了刘备。项羽的坐骑乌骓一生忠主，其四蹄皆白、通体乌黑，又称“踢雪乌骓”，在项羽自刎乌江边后，也随之跳江而亡。

马不仅走入战场，还走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唐朝还是一个尤其迷恋马球的朝代，上至帝王，下至贵族、百姓都很热衷于这项运动。唐代大明宫设有多处球场，皇帝经常带着文武大臣、妃嫔在此比赛；甚至民间女子也会组织鞠球，只不过因马速太快，不太安全，所以从马鞠变成了驴鞠。

春秋时期的伯乐擅长相马，后来到达秦国，受到秦穆公的重视，推进了秦国的富国强兵计划，并写了《相马经》一书。后世以“伯乐相马”寓意擅长识别人才。而在历史上，马与人之间形成默契、彼此成全的感人故事，则一直流传至今。

（上接1版）加大倾斜力度，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办好特殊教育，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以“互联网+”教育更好实现教育有效均衡。围绕促进共同富裕，在“有学上”基础上加快构建满足人民“上好学”愿望的教育体系，努力让教育资源全程伴随每个人、让教育成果平等面向每个人、让教育过程全面发展每个人、让教育效能深度助力每个人，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四是坚定不移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六中全会强调，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强调“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坚持“四个服务”，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健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始终把教育放在“两个大局”中考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推进不同阶段教育差异化发展、分类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要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加大对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急需、冷门学科专业的支持力度，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把绿色低碳要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教育大资源建设与应用。加快高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集中攻关，以高质量科技创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加快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深化依法治教，强化督导权威，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加强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大先生”，培养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五是坚定不移传承弘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鼓起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职员工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等“十个坚持”历史经验，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密钥”，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与时俱进、传承弘扬。

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险阻。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十个坚持”历史经验的丰富内容、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将其作为正